

革命与乡土

——晋察冀边区的乡村建设与孙犁的小说创作

周维东

内容提要 孙犁的小说创作与晋察冀边区的乡村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其早期创作的“荷花淀”系列小说，是晋察冀边区在创建阶段尊重乡土传统，“革命”与“乡土”相生共融的真实反映；他创作的转型，与“土地改革”全面开展后，“革命”与“乡土”由共融走向对抗有深刻关联。考察孙犁小说创作与晋察冀乡村建设的关系，可以更深刻把握孙犁早期小说的内在特征，也可以更理性把握孙犁与“革命文学”的关系，他的成功与迅速边缘化，都体现出“革命追随者”作家必然的宿命。

无论是在“解放区文学”还是在更宏大的“革命文学”序列中，孙犁都是个独特的存在，常常使研究者无法在“解放区”、“革命”与其个性特色之间找到合适的纽带，从而造成研究的瓶颈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回到孙犁抗战时期生活和工作的晋察冀边区，孙犁与“解放区”和“革命”的关系也并非那么紧张和微妙，他创作的“荷花淀”系列小说，不过是如实描绘了晋察冀边区在创建阶段尊重乡土传统，从而出现“革命”与“乡土”相生共融的情景；他创作的转型，与“土地改革”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，革命与乡土的关系从“共融”走向“对抗”有着深刻关联。

抗战时期边区的乡村建设活动，很多史著将其简单归纳为“土地改革”。从宏观的角度，这种概括不能说不准确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的确是以“土地改革”为核心——不管是抗战前的“土地革命”、抗战中的“减租减息”，还是抗战后的土地制度改革，都针对了土地问题，差别不过是程度和方式的不同。但如果较为微观地考察边区的乡村建设运动，这种概括又不甚准确，尤其是将之作为文学考察的语境，它更有不科学的地方。首先，中共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，仅就抗战时期来说，“减租减息”在不同边区的表现就有很大不同：在经历了“土地革命”的地区，“减租减息”

要么形同虚设，要么被强制执行；在未经历“土地革命”的边区，“减租减息”也有很大不同，有的地区群众基础好，“减租减息”就变成了土地革命的延续，有的地区群众基础薄弱，“减租减息”被和风细雨地开展，成为“统一战线”的武器。其次，就中共领导下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而言，特别是对于乡土传统的态度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所不同。中共领导的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道路，决定了其必须正视近代以来日趋溃败的乡土社会，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，中共对于这种事实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：在抗战的大部分时期，中共为了巩固“统一战线”、壮大自身实力，对于乡土传统选择了尊重和保护的姿态；而在抗战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为了迎接解放战争，中共开始大范围开展土地制度改革，对于乡土传统选择了改造并重建的姿态。从字面上看来，中共抗战前后农村政策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，但落实到具体生活，这种差别性会被放大并形成鲜明反差。对于文学家而言，他（她）们对世界的感知主要不是来自某种理论或某个政策，而是生活直接产生的影响，因此对于中共在边区进行的乡村建设而言，当局的政策解读自然重要，但现实效果更能激发他（她）们的文学思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边区对待乡土传统的不同态度以及造成的影响，敏感的作家不可能不有所感知——孙犁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
一 从“白洋淀”到“荷花淀”

提起孙犁的小说，让人直观想到的作品当属反映白洋淀水乡生活的《荷花淀》，虽然从艺术成就的角度，其解放后创作的系列小说并不亚于（甚至超过）这部作品，但“荷花淀”依旧成为孙犁小说创作的标签——“荷花淀派”的说法正反映了这种现实。“荷花淀”与孙犁的紧密联系，不仅因为这是其成名作的名字，更缘于这个写作对象与其写作风格的高度融合，方纪回忆初读这部作品的印象：“‘荷花淀’的出现，就是从冀中平原上，从水淀里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，带着乡音，带着水土气息，使人头脑清醒。”^①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对孙犁小说和其笔下白洋淀共通的印象。

在孙犁的笔下，白洋淀似乎自古便如其笔下的“荷花淀”，他在《荷花淀》里这样写道：

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不知道。只晓得，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，全淀的芦苇收割，垛起垛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，在场里院里编着席。编成了多少席？六月里，淀水涨满，有无数的

船只，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庄，就全有了花纹又密、又精致的席子用了。^②

这段描写与后面的故事联系在一起，给人的印象，似乎是白洋淀地区经济的富庶造就了“荷花淀”的浪漫与诗意。孙犁另一篇反映白洋淀生活的小说《采蒲台》，为这种印象提供了佐证，小说将历史上的白洋淀称为“鱼米之乡”^③，这就更让人有理由相信，“荷花淀”不过是白洋淀地区诗意生活的再次呈现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考察白洋淀地区的历史，孙犁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。

白洋淀的地理位置主要在民国时期的安新县（约占80%以上），部分在雄县、任丘、高阳和容城，根据孙犁在安新县同口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其小说中描写的情况，“白洋淀系列小说”发生的地区大概在安新县境内。然而，历史上的安新绝非“鱼米之乡”。安新县所在区域处于潞龙河、大清河、孝义河、唐河、府河、漕河、瀑河、萍河、白沟引河九河下游，洪涝灾害严重，我们可以根据一份1931年安新县、高阳县土地情况的比较，了解其当时的县情。

1931年安新、高阳农业产值对比^④

县名	农户（户）	土地总数（亩）	户均土地（亩）	农业产值（元）	户均产值（元）	亩均产值（元）
安新	14030	370400	26.4	301000	21.5	0.8
高阳	23580	295200	12.5	5157700	218.7	17.5

两县比较，安新县的土地总数和户均土地量都具有优势，但由于单位亩产值极低（与高阳相差20余倍），户均产值反而不及高阳县的十分之一。如此悬殊的土地产值，已经超出一般土地等级的差距，主要原因只能是灾害等外在因素。

由于土地收入缺乏保障，白洋淀地区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苇席编织和捕鱼，这也是孙犁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两种生产方式。苇席编织在白洋淀地区源远流长，作为一个行业兴盛于明清之际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拓展了白洋淀苇席的市场。白洋淀所产苇席除本省销售外，主销北平、天津和关东，而随着华北各港口开埠，苇席业开始有部分出口^⑤。虽然白洋淀苇席产业发展尚好，但从事苇席编织的家庭并不富裕。有研究者曾经对30年

代初期河北定县西坂村进行过调查，该村1100户人家中有770户从事席业，村中设有席市，属于席业较为发达的地区。调查结果显示：该村织席户平均每户人口4.43人，有2.37人参加织席，每人全年平均工作189.11天，而每户全年席业收益仅57.08元，这个数字占家庭全年收入的37.56%^⑥。可见，作为副业，编席为家庭创收的作用不能算低，但依靠席业发家致富却不大可能。一些事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，白洋淀地区苇席编织业从不收税，清光绪年间，“有牟利之徒，呈请开席苇捐者，经邑绅王君士彦条陈利害于各上宪，其议乃寝”^⑦。到民国十四年，潘希福等人“以补助军饷为名，议设席苇捐”，开始在安洲集市开收捐税，结果激起民愤，造成骚动，迫使省公署严令禁止：

“如有私牙影射抽用，查明依法惩办。”^⑧从政府听从绅士劝阻不收税到收税导致民愤，都可见编织农民生活的艰辛，稍有额外负担，便难以承受。

孙犁小说中描写的白洋淀生活，大多数发生在深水区，这里的家庭以捕鱼为主业，编席只是日常收入中很小一个副业。白洋淀渔业资源丰富，捕鱼源远流长，至抗战前夕，淀上最多有超过15000人捕鱼，全年产量可达21830000斤，产值达873200元，规模相当可观^⑨。白洋淀的渔业也不限于本地销售，在抗战前夕有38%销往外庄，即京庄、卫庄和府庄（北京、天津、保定），62%销往内地，包括安新、徐水、容城、高阳、安国、任丘、河间等数县。相比于苇席生产，白洋淀渔民家庭多种经营：“春日无水时，操作农事，夏季山洪暴涨，入秋则捕鱼捞鱼鲜，并以割苇采藕、采菱、养鸭以及夏日冲船工冬日撑冰床为副业，终年操作，经济尚称富裕。”^⑩不过，虽然相对苇席编织的农户，白洋淀深水区渔户的生活略显富足，但由于粮食生产的薄弱，渔户生活受制于市场和中间商，生活始终存在风险，并不易实现孙犁小说中表现那般优裕和自足。

抗战爆发后，白洋淀地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战争环境下，白洋淀与外界的商业联系难以畅通，日伪政权加强对商业流通的控制，自由贸易很难正常进行。《采蒲台》反映了日伪政权控制市场的情形，主人公小红和母亲到集市去出售渔网和苇席，因为苇席和渔业自由市场遭到破坏，质量上乘的渔网不再受到渔民的青睐，而苇席只能在指定地点被贱卖。《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》则反映了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形，兵荒马乱当中，渔民不敢出去捕鱼，生活自然受到影响。

由于白洋淀属于战略要地，中共对该地区的控制较晚，直到抗战接近尾声，它才成为较为稳定的根据地。在成为稳定根据地后，中共在该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，主要手段是通过“合理负担”、“统一累进税”、“减租减息”、调控土地流转等法规政策，实现土地资源的分散，激发无地、少地农民的生产热情，使遭遇危机的小农经济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。对于白洋淀主要产业——捕鱼和苇席生产，中共通过稳定市场环境、提高产业竞争力等办法，保障两大产业的发展。为了使白洋淀商业环境不被破坏，抗日政

权制定了严密的人、出关政策，独立发行边区货币，建立合作社统一经营地方贸易，1944年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在白洋淀设立隆昌商店，是这些政策的典型体现。隆昌商店的本质是合作社，资本来源于参加合作社成员的原始股本，主要经营根据地内农业、手工业产品和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，农民在正常生产所得外，还参与合作社分红。隆昌商店成立后，曾经将该地区的苇席、鱼虾、大米、土布、火硝、食盐等运往平汉路以西的山区推销，然后采购山货药材等物品回来，以调剂平原和山区的物资^⑪。这种纯粹小农生产无法实现的经营方式，使许多家庭的生产和收入得到保障。

中共抗日政权在白洋淀地区组织的乡村建设，在战时对于改善民生应该说卓有成效，但就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来说，也不可能达到战前水平。只能说，对于长期受到商业风险威胁的白洋淀人民来说，中共采取的经济政策，带给了他们极大的稳定性。

不过，虽然中共的经济建设对当地没有产生太大影响，但很多优待抗属的政策，实际改变抗战家庭的生活。就《荷花淀》来说，水生一家的恬淡生活并不来自于经济建设，而是根据地的优待抗属的实惠。小说中，水生在参军前夜嘱咐妻子：“家里，自然有别人照顾。可是咱的庄子小，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。庄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别人，家里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华还不顶事。”^⑫一语道出了问题的真相，在根据地抗属优待的政策下，水生参军后，水生嫂即使不参加生产也可生活无忧。而《荷花淀》一开场，水生已经是小苇庄“游击组长”、“党的负责人”——属于预备军人，在地方上已经可以享受优待，正是如此，水生嫂编织苇席才显得从容淡定，水生干工作也可以全心投入。

中共在晋察冀优待抗属政策，不能不说十分成功。中国农民并没有踊跃参军的习惯和觉悟，在古往今来的文学叙事中，徭役都是导致悲剧的外在力量，因为兵役而出现恬淡和谐的局面很难见到。晋察冀优待抗属政策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充分尊重了当地的乡土传统和乡民心理。农民不愿意参军，有观念的因素，譬如：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、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等说法，会成为农民参军的阻力；有现实的因素，如劳动力丧失，

会影响家庭收入,导致家庭贫苦。晋察冀边区通过的《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》(1938)和《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》(1943),在实物、劳力和精神三个层面给予抗属优待,让参军家庭不仅不会由于参军而导致家庭困顿,反而因此获得实惠和荣誉。在政治的干预下,白洋淀地区的抗战家庭获得了日常生活的充裕,而孙犁的白洋淀书写,又将目光紧紧锁定这些家庭——这正是在孙犁笔下,“白洋淀”能够成为“荷花淀”的秘诀。

二 家庭、婚姻中的乡土秩序

在孙犁的小说中,很多作品都围绕家庭生活的主题展开,有直接写家庭成员之间的故事,如《荷花淀》、《“藏”》、《丈夫》、《嘱咐》、《黄敏儿》等;有以家庭生活为背景,反映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变化,如《麦收》、《蒿儿梁》、《碑》、《邢兰》、《芦苇》、《光荣》、《浇园》、《纪念》、《山地回忆》、《采蒲台》、《铁木前传》等。对根据地人民家庭生活的关注,是孙犁小说主题的一个显在特点,也是透视其美学风格的重要切入点。

家庭是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,费孝通对“乡土中国”的概括,主要内容都与家庭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。这也不难理解,“乡土中国”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,在小农经济制度下,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,这种经济制度下的文化生产离不开家庭因素。孙犁小说的乡土气息,就在于写出了家庭生活的自然和自足。

小农经济下家庭生活的自然与自足,缘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。小农生产的周期较长,生产者不必恪守严格的时间规范,只需依照农时生产即可,生活当然十分自然。另一方面,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具有封闭性,以举家之力,足以完成生产的全部过程,获得大部分家庭所需物资——如果家庭收入足以应付一家所需,家庭完全可以不跟外界发生太多社会联系。在此背景下,“自足”就出现了。不过,从现实的角度,小农家庭如果不能获得生产资料的保障,不拥有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土地和生产工具,自然和自足只是痴人说梦,在历史上——尤其在人均土地占有日趋降低的背景下,很多家庭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标

准。也正是这个原因,历史记载中的中国乡村,远没有文学中那般美好和诗意。

近代华北乡村(孙犁小说情节主要发生的区域),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,主要原因有近代中国普遍的问题,也有华北地区的特殊性。就普遍的问题而言,华北农村经济面临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外国资本的威胁。人口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减少,进而导致一些家庭破产,土地朝一些善于经营的家庭集中。外国商业资本的介入,对农村手工业造成破坏,虽然一些民族手工业,如前文提到的苇席业,由于没有替代产品依旧获得了增长,但多数可替代手工业都遭遇极大挑战,譬如在近代华北有良好纺织手工业基础的高阳县,在洋布洋纱进入中国后,影响巨大^⑧。就华北地区来说,土地资源、交通和周围商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,导致类似江南地区的“小农经济商品化”——即通过特色种植、家庭手工业来缓解土地不足的情况,并没有大面积出现^⑨。华北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事实,孙犁的小说也有反映。《蒿儿梁》中,妇女主任一家便是破产农民,她们对战局十分关心,因为只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,她们才能继续租种川里地主的土地,日子才能得到改善。《邢兰》中,邢兰是一个类似“拼命三郎”的农民,但在八路军到来之前,即使如此拼命的一人,家中依然一贫如洗。

在极度贫困的境况下,孙犁小说中家庭温馨、民情淳朴、恬淡自然的场面其实很难实现。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生活的保障,《荷花淀》、《“藏”》中夫妻温馨浪漫的场景很难发生;如果没有家庭经济改善,《山地回忆》、《芦苇》、《吴召儿》中村民的善良和慷慨难以成为现实;如果没有小农经济的恢复,《碑》、《纪念》、《蒿儿梁》中小农家庭表现出的温情和大义也难以出现。可以说,孙犁小说中极具乡土诗意的家庭生活,在整体上与晋察冀边区对小农经济的保护不无关系。

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,以扶持和保护农村普通家庭的生产为目的。作为一个抗战时期拓展而来的根据地,中共在晋察冀边区主要实行“减租减息”的经济政策。晋察冀减租的标准,在所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程度也比较低,属于“二五减租”,即在过去地租的基础上减去25%。此外,减租减息政策还包括民间债务

的利息标准年利不超过1分；严禁庄头剥削；禁止太粮、杂粮、小租、送工等额外附加；禁止出门利（即现扣利）、剥皮利、臭虫利、印子钱等高利贷；等等。如此，既降低了正常的地租和利息，又避免了中间剥削、过度剥削的产生——许多小农家庭的破产，直接原因便是这些因素^⑤。与减租减息相适应，边区政府通过自身力量鼓励生产，譬如减免税金、鼓励开荒、给予贷款、技术支持、水利建设等等^⑥，帮助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家庭重新投入生产，使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的家庭，再度扩大生产规模。在这两者的结合下，“减租减息”的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关系，但通过政府支持和小农经济的恢复，土地实现了合法分散，中农和富农家庭普遍增多，地主占有土地量有所减少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曾经失去活力的华北农民家庭，才可能重新焕发生机。

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孙犁小说中关于婚姻爱情的浪漫描写是其整体特色之一，而这也与边区的乡村建设关系紧密。在小农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况下，华北地区的婚姻制度日益扭曲，典型的表现是“婚姻论财”现象突出^⑦。所谓“婚姻论财”，即女方家庭将婚姻作为谋利的手段，不达到一定数额的彩礼，不能谈婚论嫁。在“婚姻论财”的风气下，原本自然、和谐的爱情和婚姻朝畸形化发展，这种现象在孙犁的小说里也有反映。孙犁的小说《正月》和《蒿儿梁》里，就反映了“婚姻论财”导致畸形婚姻的一种倾向——“老夫少妻”。《正月》介绍了“老夫少妻”形成的原因：“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，给地主家当长工，苦到四五十岁上，有些落下的就花钱娶个女人，名义上是制件衣裳，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。丈夫四五十，女子十三四，那些汉子都苦得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，不上几年就死了，留下儿女，就又走母亲的路。”^⑧这里的“外乡单身汉”，范围可以扩大，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都可能加入到“外乡单身汉”的行列，他们没有经济实力正常娶亲，只能依靠半生做长工的积蓄，娶一个妻子。年轻的女子愿意嫁给这样的丈夫，多半因为家里过于贫困，索要礼金很高，只有这些大龄的长工愿意投入——《蒿儿梁》中的女主任就是这样。《光荣》里的原生和《铁木前传》中的大壮则提供了另一种畸形婚姻——“少夫老妻”。“少夫老妻”

在中国民间比较普遍，很多乡土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华北地区“少夫老妻”现象的形成有两种原因：一是社会风气使然，近代华北地区流行结婚女子比男子大五岁左右；二是养童养媳，这种男女年龄差距常常会更大。从根源上来说，不管怎样状况下造成的少夫老妻现象，都有经济的考虑：就前者来说，娶年龄大的女子可以对家庭生产有更直接的帮助；而对养童养媳现象而言，回避彩礼支出和增加劳动力是主要的考虑。总之，在华北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况下，自然和谐的爱情婚姻也随之扭曲变形。

抗战政权的建立，改变了当地的婚姻状况，特别是对于自由恋爱的发展，起到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。边区政权对婚姻制度的改变，根本是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形态，表现在婚嫁习惯上，是“革命标准”对“财富标准”的替代。具体来说，在抗日政权建立后，当地民众对婚嫁对象的考察，对“革命程度”的重视已经超过了“财富数量”。《小胜儿》中的穷小子小金子，他能够获得乡民的喜爱，并得到漂亮的小马鞭，不是因为有钱，而是因为他骑兵团主任的勤务兵；《正月》中，多儿一家人对其娶亲对象的考察，革命程度也大过了财富数量，这使她最终坚定地选择了新农会副主席刘德发。《黄敏儿》中，主人公王振中是富农家庭的媳妇，却不满足自己的婚姻状况，千方百计脱离家庭参加革命，在她的心目中，“革命”显然高于“财富”。在乡村世界，革命标准能够成功取代财富标准，离不开革命的武力后盾和抗日的道义支持，但不管怎样都改变了“婚姻论财”，为自由恋爱提供了制度和现实的保障。

三 “革命”与“乡土”的暧昧

孙犁小说与一般农村革命题材小说的区别，在于他笔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乡土世界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些可能是贫农（如《邢兰》中的邢兰、《蒿儿梁》中的女主任、《正月》中的多儿等），有些可能是中农或富农（如《荷花淀》中的水生、《“藏”》中的浅花、《碑》中的老金、《村歌》中的双眉等），有的甚至生活在地主家（如《黄敏儿》中的王振中），但“身份”并没有构成他们的本质差别，他们都具有淳朴和善良的特征，

都对于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孙犁早期小说中的乡村，不是完全“革命化”了的乡村，而是乡土与革命在抗战时期相生相长的特别状态。

孙犁小说的这种独特性，与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环境有关。晋察冀边区是中共在抗战中新发展起来的根据地，其以靠近陕甘宁的山西为突破口，不断向东向北拓展，建立起以乡村为主要活动区域、零星散落的“网状根据地”^⑨。在晋察冀，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犬牙交错，日伪控制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，抗日政权控制乡村和偏僻地区，双方的势力范围随战事拉锯消长。在这种政治环境下，为了巩固边区的稳固性，抗日政权不得不借助乡土力量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党建工作颇能说明这一情况，由于群众对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主张不能及时接受，基层党的工作者不得不利用乡缘乡情“拉夫”入党，在具体做法上不乏用现实利益相诱惑。晋察冀党组织曾经在1941年对平山县3村、曲阳县1村、孟县4村共8村195名党员入党动机进行调查，结果了解放和抗日入党者96人，仅占全部党员49%强；随大流入党者51人，占26%强；而纯粹为了经济利益和私欲而入党者48人，占24%强。^⑩就党员的成分而言，晋察冀基层党员的阶级成分也十分复杂，1948年平山县委对该县4个村庄255名党员进行调查，发现地富出身32人，占12.5%强；中农、富中出身164人，占64.3%强，贫农、中贫出身58人，占22.8%弱；工人出身仅1人，占0.4%弱。^⑪党员中涵盖了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各个阶层，如果从党员阶级成分的比例看，党员主要停留在中农以上的阶层。有了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孙犁的小说中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。

其实，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整体农村政策也充分考虑到乡土传统的力量。在土地政策上，割据时期推行的“土地革命”基本停止，取而代之为“减租减息”。虽然“减租减息”在各地执行标准不一，但其指归是不破坏乡村社会的既有结构。在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上，中共在抗战时期没有急于推广之后奉行的“合作化”道路，而是鼓励以家庭生产为主的“富农经济”。“富农经济”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，虽然为了扩大生产规模，也出现了家庭农场化的集体合作，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属于家庭而非集体，没有出现“因公废私”

的倾向。在战争组织与动员上，中共尊重并借助了乡土传统的力量，如：为了让更多人参与生产，根据地吸收了农民渴望发家致富的“起家”传统，鼓励老百姓“起家”；为了鼓励农民参军，给予他们优厚待遇；等等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，革命与乡土出现了共融的暧昧地带。

孙犁早期的小说，准确地捕捉到革命与乡土暧昧状态的美学特征，这使得他的小说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小说，也不同于一般的乡土小说。他的小说，可以从“乡土”和“革命”进行双重解读。

孙犁抗战小说的重要内容，是表现晋察冀人民踊跃抗战的现实。从“革命”的角度，它反映了底层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屈反抗的历史图景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“全面抗战”路线的缩影——是典型的革命主题。然而从“乡土”的角度，这些内容也可以说与“革命”无关。在孙犁的小说中，“侵略者”与“抗战力量”都是乡土社会的介入者，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：前者破坏了乡土生活的正常秩序，后者则是乡土生活的维护者和恢复者，对底层人民而言，拥护抗战、抵抗侵略并非政治觉悟，更是现实选择。《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》中，撑船老汉所讲的鸡与女孩的故事最有典型性，为什么没有成熟意志的动物和小孩都参与抗战，因为日寇破坏了乡土生活的平静和自足。《蒿儿梁》中，底层农民为什么积极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，因为依靠中共的军事力量，他们本已潦倒的生活有了现实保障。《“藏”》、《邢兰》、《正月》、《黄敏儿》等作品反映了另一种情况，参与抗战可以获得尊重和荣誉：新卯参加抗战提升了自己在家庭的地位；邢兰和多儿通过抗战提升了自己在当地的地位；王振中通过参加抗战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。

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，在许多主流的历史著作中，都被描写成现代战争，如：土地政策、政权建设、抗战组织与动员、作战形式等元素，被视为“现代”的外在表现；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，这些现代因素被认为是制胜法宝。孙犁小说也表现了敌后抗战的“现代”特征，如：乡民选举、妇救会、青先会、游击队、合作社等新事物，在其作品中常常出现，并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。但另一方面，孙犁小说中的抗战故事，也可以从传统民间心理的角度去理解。在中国民间社

会,“家国情怀”深入人心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观念有着旺盛的生命力,而晋察冀所在的“燕赵之地”,本来就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孙犁小说十分注意这些传统文化心理。《荷花淀》中水生参军,他父亲说:“水生,你干的是光荣事情,我不拦你,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,什么也不要惦记。”^②而水生对妻子的交代是:“不要叫敌人奸淫活捉的,捉住了要和他拼命。”^③他们谈话中所体现出文化观念,并没有多少现代内涵,更多是民间流传的家国情怀和儒家伦理。《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》中,主人公说:“同志,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,尤其是女人家,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”^④。这种刚烈的性格,唯一的解释便是燕赵文化的持久影响力。此外,在许多作品中,很多底层农民因为参加抗战而获得尊重,这种现象除了中共在抗战中善于宣传造势,也是儒家伦理在民间影响的结果。

由于革命与乡土的暧昧,孙犁小说力图呈现的审美典范也同样具有暧昧性。譬如其对根据地女性美的刻画,乡土色彩十分浓厚,《“藏”》中的浅花是孙犁笔下“美”的典范之一:

这个女人,好说好笑,说起话来,像小车轮上新抹了油,转得快叫得又好听。这个女人,嘴快脚快手快,织织纺纺全都行,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。她纺线,纺车像疯了似的转;她织布,挺拍乱响,梭飞得像流星;她做饭,切菜刀案板一齐响。走起路来,两只手甩起,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。^⑤

这种勤劳能干的女性形象,只有在乡土世界里,才具有最大的美感。从革命的角度来说,革命也需要这样的女性形象,当男性纷纷奔赴战场,日常生产和后勤补给只能由这样勤劳能干的女性来完成。但是,仅仅勤劳能干还不能满足革命的需求,革命还需要女性能够超越家庭,对于革命事业保持理解和支持——而这显然超出了一般农村女性的政治素养。浅花在作品中表现出超越一般农村妇女的特征,她要求丈夫新卯积极参与抗战,并对于参与抗战的其他同志也十分拥护,这使其形象更符合革命的美学要求。不过,从现实的角度来说,浅花的革命大义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基础,在传统女性审美当中,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才符合女性的角色定位,要求丈夫承担公共事务

的责任,是一个优秀“贤内助”妻子的必然选择,只是在抗战当中,公共事务具体化为抗战事务而已。可以说,正是在抗战晋察冀边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,革命和乡土变得如此水乳交融。

四 一个反例:“土改”之后的孙犁创作

“土地改革”的广泛开展,标志着边区乡村建设思路的整体改变。土地改革的目标,是改变中国封建社会以来建立的土地制度,以及在此制度下形成的乡村社会格局——土地改革与乡土传统之间,对抗远远大于共融。^⑥对于铺天盖地而来的土地改革,孙犁不得不参与其中,不仅要作为“土改”干部直接参与土改,在创作上也必须反映这场运动。不过,当孙犁开始审视土地改革中的乡土世界时,“荷花淀”般的和谐和浪漫消失了,代之而来是一系列现实矛盾和问题,有时还出现了对生活的困惑和迷茫。孙犁小说的这些转变,我们也可以从革命与乡土的关系去理解,它正好作为一个反例,说明孙犁早期小说风格与晋察冀乡土建设之间密切的联系。

乡土世界的魅力之一,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自足感。在尊重乡土传统的背景下,边区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强化了农民生活的自足感——以此巩固边区的稳定性。“土改”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地区的稳定性,恰恰相反,它要通过乡土社会格局的彻底颠覆,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。而当群众通过暴力斗争,轻易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果实时,他们的自足心理同时被打破,取而代之的是私欲的无限膨胀。《铁木前传》中的黎老东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。在革命到来之前一贫如洗的黎老东,通过“土改”彻底改变了经济状况,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,但他自足的心态也随之被打破:他没有对生活充满感激,反而丢弃了善良、仗义和热情的品质,为建更大的家业,不惜与朋友、邻里决裂,走上与财主同样的剥削道路。《村歌》里,“土改”得来的大量浮财,打破了乡村的平静,荣军和烈属纷纷仗着自己的资格来要财产,态度恶劣,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。两种情形,十分类似巴金在抗战后创作的《憩园》,园子不变园内的封建残魂就难以消散。其实,自足和私欲是农民身上同时存在的两种性格,

当“土改”打破了乡村格局，农民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。

与“自足”紧密相关，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体现出自然的人情美。孙犁很多作品如《山地回忆》、《碑》、《浇园》、《纪念》、《女人们》等，都通过八路军与乡民关系，赞美乡民的淳朴和善良。“土改”及其伴随而来的“合作化”，改变了农民生产的方式，也加强了彼此的利益纠葛，与之俱来的便是自然人际关系的破坏。孙犁笔下，乡村人际关系被破坏的第一种情形是财产再分配，《石猴》典范地反映了这个问题。小说首先提到小官亭地区由于历史上比较贫困，可以平分的结果比较少，农民在平时斤斤计较、喋喋不休，原本自然简单的人际关系已不复存在。如果说小官亭的问题是分配财产太少，财产充足的大官亭却出现了更加悲剧的事件。主持分配财产的老侯，拿了平分财产中的一段废缎子和一个石猴做了烟包和吊坠——如果比较战争年代农民为八路军作出的种种牺牲，譬如《山地回忆》中的袜子、《小胜儿》中的棉袄，这几乎不算什么，但小小的石猴和缎子却给老侯带来无穷的灾难。小说的结尾，代表政府对这个事情表态的老邵说：“兴妖作怪不是猴儿，是我们的敌人，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。老侯同志作风不好，叫人家借尸还魂，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。”^⑧这话有值得思索的空间：“我们的敌人”是谁呢？老侯受处分除了自身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？从整篇小说表现的情形看，孙犁认为的“我们的敌人”恰恰是人民自身，当长期个体生产的农民之间有了利益的瓜葛，他们既不能从集体主义出发来看待正在发生的社会改变，曾经拥有的自足和自然也逐渐消失——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第二种情形是因为阶级斗争。阶级斗争在民间的普及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最大，在一系列“红色经典”当中，我们不乏看到“土改”中群众斗争大会的壮观场面。近年来，不少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群众斗争的人为性，即近代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不如许多著作中描述的那般激烈，很多群众斗争大会都是在不断动员、组织下完成。^⑨孙犁小说很多时候回避了土改中激烈的阶级斗争，但在一些作品的细节中也能捕捉到蛛丝马迹。《村歌》的下篇，双眉风风火火拿着青稞桔的

形象让人记忆犹新，如果追踪双眉为什么拿起这个“武器”，就必然要追踪到“土改”中对地主的斗争——双眉是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。孙犁虽然隐去不表双眉在地主斗争中的表现，但可以想象可能正是依靠“青稞桔”的暴力行为，她才能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脱颖而出。另一个细节发生在保卫庄稼的场景中，当双眉面对同一宗族的爷爷辈地主郭老汉，拿着撅枪坚决和他划清界限，这其实是阶级斗争打破当地宗族传统的一个例子。在乡村社会，“长老权力”^⑩具有重要的权威性，但在阶级斗争面前，它的权威性已不复存在。

第三种对自然人际关系破坏的情形是集体生产。中共在乡村建设中，一直注重通过集体生产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，这种策略在“土改”中被推向高峰，“互助合作”便是一个阶段的重要做法。“互助合作”对于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十分有效，但新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。在《村歌》的上篇，双眉、大顺义、小黄梨等一大批人被拒绝在互助组之外，人为制造了人和人之间的分裂和隔阂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互助组为了提高效率和保持纯洁性，将这部分影响声誉、可能“拖后腿”的人就淘汰了下去。在淘汰的人当中，大顺义和劳动英雄李三还是一对夫妻，她们之间的隔阂在小农生产中纯粹家庭内部问题，但在集体生产的统一标准下，变成了先进与落后、好与坏的根本差别。

与土地改革伴随而来的互助合作运动，将现代生产方式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，由此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种种束缚和不适。《村歌》对双眉组织互助组的描写，让我们感受到农民遭遇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后的不适，双眉组织的互助组是一大批落后分子组成，她们之所以被认为是“落后”，根本原因就是她们自由散漫，不能及时适应集体生产的节奏。《铁木前传》中的六儿和小满也反映了这种情况，单纯从审美的角度，这两个人可以看作是乡村世界里自然的精灵，因为喜爱自由，两人不能适应集体化整体划一的工作，但因此成了“问题青年”。“自然之子”成为“问题青年”，不能不归因于乡土社会的巨大转变。

对于革命与乡土关系的剧烈改变，身在革命阵营中的孙犁显得有些猝不及防：他必须紧跟革命的步伐，但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，让他又不能

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。体现在文学上,孙犁力图在作品中继续呈现革命与乡土共融的情景,但生活中的许多具体细节,让他的作品缺少了之前的圆融和自然——有些时候,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到一种迷茫的感受。表现在作品当中,孙犁反映“土改”的小说,“善”和“美”常常发生了分离。

《村歌》中的双眉是个从“落后”到“先进”的转变模范,在小说开篇她是个被抛弃在外的落后分子,到小说结束的时候,她已经成长为革命的主力。然而,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看待双眉,其从“落后”到“先进”转变,恰恰又是从“美”到“不美”(至少是“不够美”)的过程。在双眉被互助组排斥在外是一名“落后分子”时,孙犁这样描写她:

她听见吃吃的笑声。转过脸来,看见一位姑娘抱着一个小孩,正用青秫桔打枣,逗着小孩笑。这姑娘细长身子,梳理得明亮乌黑的头发,披在肩上;细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身,下身穿一条短裤,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。^⑤

漂亮单纯的双眉如同《边城》中的翠翠。如果再详细了解她:她勤劳能干,能织出别人不能织出的花布;爱好文艺,喜欢编排戏剧;单纯善良,对于生活充满了热爱;独立好强,任何工作都力争上游。这样的女性,是孙犁之前小说中女性美的集合体。然而,在双眉一步步走向“先进”时,她的“美”不是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。小说中特别用到了一个道具——“青秫桔”,在双眉还是落后分子时,它被用来打枣,不失野趣;而在双眉参加革命后,它被用来斗争地主、对付互助组中的落后分子,充满了暴力,虽然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具有正义性,但双眉“自然之子”的形象至少要大打折扣。

《铁木前传》是一部集中表现乡土社会在革命中发生转变的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,一般读者都注意到黎老东的变化,其它的一些细微变化被忽略掉了,譬如傅老刚的女儿——九儿。在作品的设计中,黎老东和九儿属于变化的两个极端,黎老东是负面的典型,九儿是正面的楷模。但是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看待九儿,这个“模范青年”相比黎老东没有长进的儿子——六儿,反而缺少了

美感。六儿不务正业瞎折腾,却保持了自然的天性,让人觉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;九儿吃苦耐劳、积极上进,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,但她仿佛一个革命的机器人,毫无趣味可言——他(她)们的变化都不是孙犁愿意看到的结果。正是这个原因,孙犁在作品的结尾用大量篇幅歌颂童年,这正反映了他内心的些许迷茫。

五 “革命追随者”作家的宿命

孙犁早、晚期创作的迥然差别,以及其在解放初期创作中表现出的迷茫感觉,使其“革命文学中多余人”^⑥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。“多余人”揭示了孙犁创作与主流革命文学之间的分歧,这种观点的出现,标志着学界对广义“革命文学”和孙犁认识的深入。不过,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,用“多余人”来定位孙犁,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:首先,如果说“多余人”代表个人与时代、潮流之间较为清晰的距离,孙犁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距离是否十分明确?其次,革命文学的“主流”是否具有较为恒定的标准,会不会出现主流标准变异或从模糊到清晰逐渐形成的状态?再次,在革命文学形成自己标准的过程中,有不少作家与标准形成距离,应该如何看待这些“多余人”与孙犁的关系?这些问题,要求我们认识到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独特性的同时,更深入探讨其独特性形成的原因。

如果我们追踪孙犁创作发展的道路,创作初期的孙犁至少没有将自己边缘化的主观意图,甚至还形成了紧跟主流的意识。孙犁在晋察冀工作时期,主要从事宣传工作,当记者写通讯是其文学生涯的起步,以至于孙犁早期许多小说都有类似通讯的意味。从记者成长起来的作家,对于媒体的需要和体现自身特性的把握比一般作家更为敏感,这在孙犁“成名”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出来。发表《荷花淀》的编辑方纪后来回忆:“读到‘荷花淀’的原稿时,我差不多跳了起来,还记得当时编辑部的议论——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”,“‘荷花淀’无论从题材的新鲜,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,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”^⑦。《荷花淀》的“横空出世”并不是偶然,孙犁后来自己回忆说:

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,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,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,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,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,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。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。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,看到我们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不但扩大,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,而妇女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,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之心。^⑨

这段话充分体现孙犁的敏感和匠心。从晋察冀来到延安,孙犁十分清楚什么能代表自己的独特性:他在抗战时期并没有在白洋淀长期工作的经历,但针对西北高原的实际,依靠自己过去在白洋淀生活的经历和听来的故事,创造了一个具有水乡特色的“荷花淀”;他清楚作为抗战后方的延安读者,十分想了解前方抗日根据地的故事,因此选择了一个战争的题材。除此之外,他从“令人鼓舞”的角度来进行创作,是否已经觉察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转变未为可知,但他与晋察冀另一位相熟作家王林(《腹地》作者)关于晋察冀不同的表现方式,及因此导致二人解放后不同的命运,也可推测他多少注意到延安文艺需要转变的信号^⑩。不管怎样,《荷花淀》在延安获得了成功,而且还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“好作品”的典范,这不能不归功于孙犁的敏感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说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,至少从孙犁主观意志和其初登文坛的状态来看并不合实际。

孙犁的边缘化,或者说他后来创作中出现的问题,在于他不能及时把握革命的变化。这不能不说是孙犁的悲哀。如果说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,那么类似孙犁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“多余人”还不在少数,他们可以统称为“革命的追随者”。与“追随者”相对应的是革命的“主导者”,他们居于革命的中心地带,对于革命形势的变化、发展了如指掌,因此也能及时把握革命的方向,成为潮流的领导者。就文学界而言,一大批聚集在延安的作家,显然是革命文学的主导者,他们参与革命文学方针的决策,始终主导着延安文学的走向,虽然在延安整风当中一大批人受到冲击、一大批作品受到批判,但这些被批判的作品曾经依然是革命文学的主导和主流。与这些革命的主导者相比,更多数基层的革命者都

只能算是革命的追随者,由于知识、阅历、信息等多方面的原因,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要么依靠政策,要么依靠对革命的切身感受和经验,对于革命形势的微妙变化始终要慢一些,而且对于变化本质的认识不可能十分准确。这些天然的劣势,使得他们只能居于“追随者”的地位——相对于主导者,必然处于“边缘”的位置。

革命与乡土的关系,对于孙犁而言,是其感受革命最初的方式——也是最重要的方式。抗战时期晋察冀的乡村建设,让孙犁感受到革命与乡土共融的特征,这是他接受革命的基础,也是他对于革命的个人理解。这种对革命的认知方式,伴随《荷花淀》的成功在孙犁的内心走向成熟。应该说正是孙犁的聪慧和敏感,让他成功从“边缘”走向了“主流”,但仔细考察历史,他走向“主流”的过程也依旧充满偶然。方纪回忆《荷花淀》能够成功的原因时说:“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,又经过整风,不少人下去了,开始写新人——这是一个转折点;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……”^⑪这里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信息:如果没有座谈会后文艺方向的转变,如果不是整风打倒一大批作家,《荷花淀》都不可能一举成功。如果孙犁要保住自己来之不易获得的“主流”地位,很多“功课”都需要补上,譬如: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是什么?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精髓是什么?延安整风的意义何在?这些问题,如果孙犁一直留在延安或许能够明白,当然这也可能改变其创作的道路——但孙犁很快离开了延安。

重新回到晋察冀的孙犁,又只能重新依靠乡土的参照来体会革命的发展和变化,然而他面对的是让乡村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。土地改革在抗战之后成为革命的重中之重,普及面之广、影响之深刻都可谓空前绝后。在这种潮流面前,任何人都知道它是革命的新方向,然而落实到孙犁十分熟悉而敏感的乡土,土地改革不是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“荷花淀”,而是要毁灭已有的“荷花淀”,这种巨大的反差,如何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化解,显然超出了孙犁的能力。

所以,如果将孙犁视为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,那么这种“多余人”应该算是一大批革命追随者在文学世界的共同宿命。革命需要追随者,

但革命文学只需要主导者，当一个作家以革命追随者的身份参与创作，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潮流和革命文学潮流面前，他们只可能昙花一现。

- ①②⑤方纪：《一个有风格的作家——读孙犁同志的〈白洋淀纪事〉》，《新港》1959年第4期。
- ②③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孙犁：《孙犁全集》（第一卷），第31页，第279页，第33页，第224页，第34页，第34页，第72页，第89页，第27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。
- ④⑤从翰香主编：《近代冀鲁豫乡村》，第443页，第416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- ⑥数据来源：张世文《定县农业工业调查》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），转引自从翰香主编：《近代冀鲁豫乡村》，第420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- ⑦⑧《安新县志》，第585页，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。
- ⑨资料来源：《白洋淀的渔业》，河北档案馆藏档案，档案号：5—2—248—2。
- ⑩张元第：《河北省渔业志》，第253页，工业印书馆1936年版。
- ⑪史立德：《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》，第416页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。
- ⑬在抗战时期，高阳的棉纺曾受到日本洋布和洋纱的冲击，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曾组织乡民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，最终达到保护民族手工业的目的。（见《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》（工商合作编）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）
- ⑭黄宗智在《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》（中华书局1992年版）中，对长江三角洲一带出现的“小农经济商品化”（即家庭成员通过拓展劳动过密型商品化生产，如特色种植、家庭手工业等，以此来维护小农生产的延续性）进行了分析，特别比较了该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差别，认为农业基础、交通和商业环境是长三角出现这种经济形态而华北未曾出现的原因。
- ⑮《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》（1938年2月），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》（上册），第31页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- ⑯《晋察冀边区奖励生产事业暂行条例》（1939年4月3日），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》（上册），第126—129页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- ⑰乔志强、行龙：《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》，第80—81页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- ⑲李公朴著《华北敌后——晋察冀》中说：“晋察冀的经济中心不在城市，因为除了阜平之外，没有一座城池。也不在镇市，许多的大镇市，尤其是冀中亦都变成了日寇的据点。在晋察冀是无数的‘经济点’构成的一面强

韧的经济网。”（第119页，三联书店1979年版）虽然李公朴此处所描述的是经济情况，但也反映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概况。

- ㉑㉒张志永：《革命性与乡土性的拮抗：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整党运动探微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5期。
- ㉓1949年颁布的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土地改革对乡土社会的态度。《大纲》第一条：“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”，实际已将农村已有的土地制度和乡土传统统统定性为“封建制度”，也就意味着要被彻底改变。《大纲》第三条：“废除一切祠堂、庙宇、寺院、学校、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”，这也就意味着宗族制度、民间信仰、民间组织等乡土社会重要要素的衰落。从土地制度入手，中共的土地改革是对乡土社会的彻底改造。
- ㉔代表论文有黄宗智：《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：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》（《中国乡村研究》（第2辑）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）；（美）韩丁的《翻身——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》（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），（加）伊莎贝尔·柯鲁克、（英）大卫·柯鲁克著《十里店——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》（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）等著作中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关的情况。
- ㉕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将乡土社会中的权力分为四种：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；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；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；社会变迁中的时势权力。长老权力的重要功能对于传统的传承作用，在十分看重血缘联系的乡土社会，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。
- ㉖孙犁：《孙犁全集》（第二卷），第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。
- ㉗杨联芬：《孙犁：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98年第4期。
- ㉘孙犁：《关于〈荷花淀〉的写作》，《延河》1978年第11期。
- ㉙《腹地》是作家王林在抗战期间以冀中“五一一大扫荡”为题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初版于1949年。与《荷花淀》相比，《腹地》更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抗战的艰苦和不易，这是其遭受厄运的根本原因。王林认为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，是其在创作过程中没能及时看到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没有领会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新动向。这种状态，为我们重新认识《荷花淀》和孙犁提供了新的参照。

[作者单位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]

责任编辑：范智红